

# 目 录

译者的话	( 1 )
序言	( 1 )
<b>第一章 苏联对外情报机关形成简史</b>	( 3 )
1. 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局—国家政治 保安总局	( 3 )
2. 情报部—第四部—工农红军情报总局	( 9 )
3. 共产国际	( 22 )
<b>第二章 中山中国劳动者大学和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b> ——为中国培养干部的熔炉	( 57 )
<b>第三章 苏维埃政权在中国的情报工作</b>	( 69 )
1. 争取承认的斗争	( 70 )
2. 驻北京的谍报机关	( 82 )
3. 驻哈尔滨的谍报机关	( 96 )
4. 驻上海的谍报机关	( 139 )
5. 驻广州的顾问和谍报机关	( 173 )
6. 张家口顾问团和开封顾问团	( 194 )
<b>第四章 在中国工作的暂时收缩</b>	( 199 )
<b>结束语</b>	( 250 )
<b>注释</b>	( 254 )

## 序 言

在苏联时期的著作中，苏联情报机关在国外，包括在中国的活动情况，是禁忌的题目。只有极少数情报人员经克格勃<sup>\*</sup>准许，或者一些专业人员经情报机关准许，才可写这方面的情况。普通的研究者最好不触及这个题目。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准许印刷在国外出版的有关情报活动的书籍。然而，近 10 年来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叙述 20 世纪 20—40 年代苏联情报机关的数十种图书和文章纷纷问世。首先想提到的是由 E.M. 普里马科夫院士主编、对外情报局出版的 6 卷集系列书《俄罗斯对外情报史概览》。同时还应说明一点，这样的出版在俄罗斯为破天荒第一次。现已出版了 4 卷，涵盖了 1917 年以前情报机关在革命前俄国的形成时期（第 1 卷）、1917—1933 年时期（第 2 卷）、1933—1941 年时期（第 3 卷）和 1941—1945 年时期（第 4 卷）。

俄罗斯已经发表一系列有关苏联情报机关的文章。国外对苏联对外情报机关的工作也早就表现出了兴趣。有关这一题材的新书和文章相继出现，档案材料不断公开，从而明显地扩充了我们对苏联对外情报机关的认识，有助于对许多新的事实和论据进行学术探讨，披露了一些新的姓名。不过应该公正地指出，我们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远没有掌握全部档案资料，对克格勃档案的研究还很薄弱，而已经公布的东西并非总是能够满足广大历史研究者的兴趣，许多人物和事实仍然未予披露，我们的历史依然留有一些空白。

---

\* 即国家安全委员会。——译者注

笔者在拙著中只是想叙述苏联对外情报机关的形成过程，特别是与远东相关的那部分，介绍 20 年代在中国的情报工作（这一工作对那一时期我国同中国的关系状况有所补充），展示其复杂性和多面性及其成就和挫折。笔者的目的在于：对国内外现存的使我们感兴趣的这一题材的资料加以综合归纳。

# 第一章 苏联对外情报机关形成简史

在叙述苏联对外情报机关形成史之前，我想指出，开展情报工作有几条渠道：一、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局、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系统；二、红军军事情报系统（情报总局）；三、共产国际系统（在此我们不提及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外交部系统）。众所周知，共产国际的所有支部在组织局中都同红军各安全与情报机关保持密切联系。

## 1. 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 保安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1917年夏季，在布尔什维克准备夺取政权之际，雅科夫·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彼得斯\*（1886—1938）领导着党内一个反间谍机关。

苏维埃俄国自1917年10月诞生之后，就面临一项重大任务——同国内各种秘密的反革命组织作斗争，而这些反革命组织大部分都同外国情报机关紧密勾结，依靠它们的援助和支持。内战，饥饿，彻底

---

\* 俄罗斯人及当时苏联其他民族人的完整姓名由名、父名、姓组成，一般按此顺序排列，但在需要突出姓氏的场合（如在名单中或人物介绍中），按姓、名、父名顺序，其中名和父名常用第一个字母代替（可放姓前和姓后）。行文时可全称，也可只称名和姓或名和父名（表示尊敬），还可只称姓或名，只称名时可用小名或昵称。这样，在书中就可看到同一个人的姓前有时出现两个字母（表示名和父名）、有时只有一个字母（表示名）的现象。如下文的Ф.Э.捷尔任斯基，视情况也可只写成Ф.捷尔任斯基。——译者注。

破坏，经济崩溃，都十分尖锐地提出了苏维埃俄国本身的生存问题。在新政权面临危机的这种局势中，为了开展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的斗争，1917年12月20日成立了由Φ.Э.捷尔任斯基领导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由于内部和外部威胁紧密相连，同内部仇视新制度的秘密组织的斗争，以及同渴望消灭新俄国及其独立自主性的大多数国家进行的反革命活动和间谍活动的斗争相互交织，所以情报工作和反间谍工作的职能不久就交给了革命的“盾与剑”——全俄肃反委员会。

档案资料表明，全俄肃反委员会在其存在的最初几个月就开始尝试进行国外情报活动。

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一开始，就必须加紧与各种各样的外国间谍机关在红军内部的破坏活动进行斗争。1918年12月19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执行局通过了《关于全俄肃反委员会军事局和革命军事委员军事监察局（军事反间谍机关）联合工作的决议》。职业革命家M.C.克德罗夫被批准担任全俄肃反委员会这个新设机构的领导人。1919年1月成立了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局，而军事监察机关和各部队的肃反委员会改组成若干特别处。1919年2月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批准了《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局及其地方机关条例》，赋予各特别处同军内反革命和间谍活动开展斗争的使命。该条例指出，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局在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监督下开展工作，完成一切任务；经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协商，任命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一个领导成员为该局负责人。特别局归捷尔任斯基直接领导，负责监督红军军官们的“政治可靠性”。

全俄肃反委员会中央机关、陆海军中大的分队和一些省建立了特别局（处），内战时期托洛茨基成功地使用了红色近卫军各团的前沙皇军官。列宁和捷尔任斯基认为，这股可观的力量应该受到当局百分之百的严密控制，这些特别局（处）也应该监视这股力量。

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局的第一任局长是M.C.克德罗夫。1919年8月，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本人被委任此职，晚些时候则由全俄肃反委员会领导成员B.P.缅任斯基担任。在特别局工作过的还有一位对外情报机关的未来领导人A.X.阿尔图佐夫（弗拉乌

奇），他出生于移居俄罗斯的意大利籍瑞士人、干酪制造者的家庭，是 M.C. 克德罗夫的侄儿。

1920 年春，同波兰的战争遭到失败，迫使苏维埃领导人更加关注情报工作。1920 年 9 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对情报机关实行重大改组。决议指出：

毫无疑问，谍报工作的组织是我们军事机关最薄弱的环节，这一点在波兰战局期间暴露得特别清楚。我们盲目地向华沙进军，遭到了灾难性的失败。考虑到已经形成的这种国际形势，我们身处其中，必须将我们情报工作的问题提到应有的高度。只有严肃的、摆正位置的情报工作，才能使我们摆脱盲目的意外行动。

为了加强对国外情报工作的领导，1920 年在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局内组建了对外处。对外情报机关就这样扎根于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局了。它未取得独立的地位，而留在军队反间谍机构之内。

为了制定情报活动的改进措施，组建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和其他许多人进入了这个委员会。根据该委员会制定的提案，捷尔任斯基 1920 年 12 月 12 日向全俄肃反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下达了如下指示：

我要求颁布由我签署的以下密令：未经我同意，全俄肃反委员会任何一个局（处）均无权自行向国外派遣谍报人员或全权代表或情报员。请草拟关于组建全俄肃反委员会对外局（同时撤销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局对外处）及任命该局局长的命令，命令还应规定，只有该局才能经由全俄肃反委员会向国外派遣谍报员。

于是在 1920 年 12 月 20 日，根据这项命令开始组建独立的对外情报机关——全俄肃反委员会对外局。

下面是捷尔任斯基 1920 年 12 月 20 日签署的第 169 号命令：

一、解散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局对外处，组建全俄肃反委员会对外局。

二、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局对外处的所有工作人员、财物、卷宗一律转归新组建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对外局。

三、全俄肃反委员会对外局隶属特别局局长缅任斯基同志。

四、任命达维多夫<sup>1</sup> 同志为全俄肃反委员会对外局代局长，他必须在一周内将对外局的编制呈报主席团批准。

五、自本命令颁布之时起，全俄肃反委员会各局与国外及外交人民委员部、外贸人民委员部、中央后送站和共产国际常设局的一切工作联系，一律通过对外局进行。

《国家政治保安局对外局境外处条例》在该局的国外工作部分中指出：

“国家政治保安局对外局境外处是一个组织中心，集中领导和管理国家政治保安局所进行的一切国外情报工作。”

“为了按照国家政治保安局对外局境外处所拟定的方案，在国外指定地点完成上述一切任务，被称为谍报站长的全权代表拥有固定的居所。”

仔细制定的对外局工作细则指出，俄罗斯联邦在资本主义各国的外交和商务代表处均将组建以谍报站长为首的驻外谍报机关。谍报站长在代表处里应该有官方职位，其谍报员的身份只能向代表处的首脑透露。该细则还指出：“每位谍报站长向中心寄送密码情报每周不得少于一次。”为了保密，将谍报机关的情报提供者用号码表示，后来在实践中又采用假名。

“合法的”谍报机关网的创建就这样迈出了第一步。对外局的工作细则还规定秘密向那些同俄罗斯联邦尚无外交关系的国家派遣全俄肃反委员会各部门的谍报机关。

这样，自 1920 年 12 月 20 日起，Я.Х. 达夫强（达维多夫）被任命为对外局代局长。

达维多夫即雅科夫·赫里斯托福罗维奇·达夫强（1888—1938）从 1920 年 12 月 20 日至卡塔尼扬被任命为对外局局长之时，即 1921 年 1 月 20 日，担任对外局代局长；而从 1921 年 4 月 10 日起，达夫强正式担任对外局局长<sup>2</sup>。

自 1921 年 8 月 6 日起被任命为下一任对外局局长的是 С.Т. 英吉列夫斯基，他在任上未干几个月，便在一次空难中牺牲了。

按照全俄肃反委员会行政组织局 1921 年 1 月 14 日颁布的第 9 号命令，组建了秘密行动局。特别局局长 В.Р. 缅任斯基兼任秘密行动局局长。该局合并了三个局——行动局、特别局和保密局。特别局（局长为 В.Р. 缅任斯基，副局长为 Г.Г. 亚戈达，局长助理为 А.Х. 阿尔图佐夫）下辖几个特科，其中第 14 特科负责东方国家业务（科长为卡卢日斯基）。过了一年，秘密行动局已经并进五个局：保密局、特别局、行动局、情报局和对外局。

按照全俄肃反委员会办公厅 1921 年 12 月 2 日第 277 号命令，制定并实行了对外局新的人员编制，同时还批准了该局新的人事配备方案：局长为 С.Г. 莫吉列夫斯基，副局长为 И.А. 阿佩捷尔，局长助理为 Р.А. 皮里亚尔和 М.А. 特里利谢尔；下辖境外处（处长为 М.А. 特里利谢尔，副处长为 Г.Е. 普罗科菲耶夫）、情报处（处长为 Л.Б. 扎林，副处长为 В.Ф. 维索茨基）、签证处（处长为 Н.Ф. 乌加罗夫）。

1921 年 12 月，米哈伊尔(梅尔)·阿布拉莫维奇·特里利谢尔（1883—1940）被任命为对外局的新局长<sup>3</sup>。特里利谢尔的档案卷宗里有他对其主管单位目的与任务的简要陈述（1922 年 5 月）。其中写道：

在外国开展的全部情报工作应该达到如下目的：

——查明每个国家境内进行反俄罗斯联邦活动的反革命集团；

——详细侦察对我国进行间谍活动的一切组织；

——获取有关上述所有工作方向的有根据的材料。

……谍报站长应全力协助全权代表工作……同时，谍报站长也有权要求全权代表同样全力协助自己工作，特别是为了保守秘密，使用联络器材，转交国家政治保安局对外局拨来的现金之时。

对于人员编制的组成，特里利谢尔特别注重干部的业务素养、外语知识、驾驭谍报机关的本领和适应瞬息万变环境的能力。他邀请几位过去同他在西伯利亚和滨海地区一起搞地下工作的老战友到对外局工作。前西伯利亚驻军司令员的情报部长 C. Г. 韦列热夫当上了他的副手，而在满洲搞过谍报活动的 Я. 明斯克尔、A. 奈曼、A. 米勒则成了对外局各处的负责人。

1926 年，根据捷尔任斯基的提议，特里利谢尔成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同时任对外局代局长。

1930 年，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他被调去领导工农检察院所属机关的工作。根据西方的资料，他是回到共产国际任职。一些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例如，1935 年 8 月 21 日，根据斯大林的提议，特里利谢尔化名 M. 莫斯克温，和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人 H. 叶若夫一起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书记；1936 年 1 月，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决定，建立了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莫斯克温（M. 特里利谢尔）为首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工作人员职业技能检查委员会”。

1922 年，全俄肃反委员会改组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直属国家政治保安局。苏联成立后，国家政治保安局又改组为苏联人民委员会直属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作为对外情报机关的对外局被列入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组建的秘密行动部编制后，开始称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秘密行动部对外局。对该局的人员进行了扩充和加强，总数已达 70 人之多。

还制定了《对外局条例》，规定了对外情报机关的下列任务：

——揭露外国境内对苏联进行破坏活动的各种反革命组织；

——查明国外从事军事、政治和经济间谍活动的各种政府机构和私人组织；

——阐明每个国家及其政府在国际政治基本问题上实行的政治路线，说明各国对俄罗斯关系的意图，获取有关各国经济状况的情报；

——获取所有工作方向的有充分根据的材料，包括那些可以用来使反革命集团的首脑人物和整个反革命组织名誉扫地的材料；

——为在国外的苏联机构和公民进行反间谍工作提供保障。

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按地理位置组建了应该从事国外谍报工作的 6 个处，后来这些处统称为科。随着驻外谍报机关数量不断增多、谍报工作的地理范围日渐扩大及一个个新的情报工作方向的开辟，谍报处数量越来越多。1930 年前夕，对外局总的人员编制上升到 122 人，其中 62 人为各驻外谍报机关的工作人员。

到 20 年代中期前，截获和破译密码情报，在苏联情报工作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特科实施这种截译活动，自 1921 年至 1937 年，Г.И. 博基<sup>4</sup> 是该科的领导人。该科早在 1921 年就在肃反委员会中开始工作，不过它当时的活动是专门性的，主要与劳改营有关。后来该科机关和人员逐渐转到情报资料的截获与破译上来。在此之前，特科的工作人员已成功查明了驻莫斯科的几个外国使馆的窃听装置。此外，他们还破译了一系列外交密码。

## 2. 情报部—第四部—工农红军情报总局

1998 年 11 月 5 日，俄罗斯军事情报机关庆祝自己诞生 80 周年。正是在 1918 年的这一天，按照革命军事委员会第 197/27 号命令，宣布了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的编制，该编制中包含登记局的编制，这个中央机构合并了此前早就存在的所有军事谍报机关。军事情报工作的目的是：收集和整理军事的、军事政治的和军事经济的情报，呈报最高领导。

但是，军事情报机关不是凭空产生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年代，俄军总参谋部下设的军务总监部负责掌管军事情报与反间谍工作。因

此，军事情报机关一直由总参谋部集中管理。军事情报机关的组织结构包括：一、野战领率机关：大本营和各方面军司令部；二、国外谍报机关：军事谍报员（即当时的所谓武官）和秘密谍报机关；三、敖德萨军区及东部的土耳其斯坦军区、伊尔库茨克军区、鄂木斯克军区、阿穆尔河沿岸军区和外阿穆尔军区的司令部。

除总参谋部的秘密谍报机关和我们在日本与中国的军事谍报员外，各军区司令部也有在远东开展谍报工作的职责。

将近 1917 年年终时，已经显而易见的情况是，俄军总参谋部军务总监部过于庞大。因此，当时决定将其一分为二：第一军务总监部和第二军务总监部。前者负责解决作战问题，后者开展情报工作，研究外国军事统计学，实施反间谍活动。第二军务总监部的领导人是曾在总参谋部军事学院任过教的 Л.Ф. 里亚比科夫少将。该部情报系统由侦获处和情报处理处组成，情报主任是里亚比科夫的助手、三等军需官安德烈·瓦西里耶维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上校<sup>5</sup>。就组织结构而言，第二军务总监部在 1918 年初由 8 个处组成。第一处（情报处）由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施瓦茨<sup>6</sup> 领导。他是总参军事学院的毕业生，上尉，1918—1919 年为莫斯科军区司令部情报部的领导人。M.B. 蔡特林在其所著《司令部的情报工作》一书中回忆道：

……十月革命后，各个司令部的工作，包括情报工作都完全停止了，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之后，由于取消了所有司令部，情报工作完全中断。虽然各种各样的游击队在搞情报活动，但是任何人都没有集中统一这些活动，情报常常遗失……由于习惯使然，谍报侦察倒是持续了一些时候，从巴黎盟国委员会俄罗斯部和外国军事使团，特别是法国军事使团，还能获取一些情报。

一直到 1918 年 7 月底，都能收到法国军事使团提供的情报综合材料。

1918 年 5 月，由莫斯科军区司令部作战部改编的军事人民委员

部作战部，参与指挥各方面军进行的战役。起初，该作战部统一领导苏维埃俄国境内所有谍报工作及部队的情报工作，同时还完成了人民委员会给予的专项任务。当时主管情报工作的领导人是 Б.И. 库兹涅佐夫（1889—1957），他在以后的年代里一直在工农红军司令部任职（1940年起为少将）。

领导国外谍报侦察的依旧是总参谋部军务总监部，自 1917 年 11 月至 1918 年 5 月，军务总监 H.M. 波塔波夫（1871—1946）主持该部工作<sup>7</sup>。

随着 1918 年政府机构迁到莫斯科，总参谋部也迁到了那里，其第二军务总监部就安置在大莫尔恰诺夫卡 20 号楼（格列博夫私宅）。就编制而言，该部依旧由侦获（侦察）处和情报处理（区域性）处组成，其一切工作人员都是总参军事学院的毕业生。远东处处长是 K.I. 埃泽林格，他负责编写统计报告和北美、中国、日本情况概述。

1918 年初，这个部改为全俄总司令部作战部军事统计局。该局编制为 7 个处，由情报主任领导。其第 6 处就是远东处，承担的任务是：“根据我军事情报机关获取的资料”，研究有关各国的情况，特别是研究这些国家的武装力量，同邻国交战的可能计划，编印军用普及手册。

3 个处归登记部门（反间谍机关）领导。另外还有军事间谍处和普通处，由军事统计局局长直接领导。

当时军事情报工作搞得糟，其典型的原因是，主要机关在行动上缺乏联系，互不协调，孤立无助，全俄总司令部、最高军事委员会和军事人民委员部作战部领导力量~~松散~~。

1918 年 6 月，全俄总司令部作战部军事统计局就当时军事情报工作的实际情况指出：

当前几个机关同时开展情报工作，相互之间大部分没有联系，完全独立地接受某一~~项~~工作计划。由于上述几个机关之间在情报工作方面没有明~~确~~的职权界限，更没有对整个情报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已经明显暴露出并令人感觉到下列消

极现象：一、几个机关在同一方向上平行工作，因此对某些地区及有关资料完全不予关注，更不去侦察；二、一些机关过分挥霍情报工作经费，而另一些机关虽然往往具有成功发展情报工作的一切条件和能力，但工作经费却十分拮据；三、对上述所有机关获取的情报资料，缺乏一个机构来做统一综合和条理化的工作。不进行总结，对不成熟的材料不进行科学系统的整理加工，这样的情报工作对事业毫无益处，它自然会衰落下去；四、由于对上述所有机关的情报工作缺乏统一领导，整个情报工作杂乱无序、毫无系统性的特征显得异常引人注目。

为了改善情报工作，建立了制定《侦察和反间谍工作总则》的委员会。其成员包括：该委员会主席 C.A. 库兹涅佐夫（全俄总司令部）；全俄总司令部作战部军事统计局代局长 A.B.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及其战友——代理情报主任 A.JI. 诺尔肯、情报处长 H.H. 施瓦茨、登记处（反间谍处）代处长 A.A. 切尔尼雅夫斯基；来自最高军事委员会的作战部长的情报助理 B.M. 沙波什尼科夫；来自军事人民委员部作战部的军事监察局（反间谍局）局长 M.G. 特拉克曼，以及各军区司令部的代表；来自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代表 Я.Г. 布柳姆金（惟一的非军事机关的人）。

这份文件共有三章：一、情报工作；二、反间谍工作；三、情报工作和反间谍工作经费。该文件确认，“对整个情报工作的领导，即对各种情报机关划分活动区域，布置工作任务，属于全俄总司令部的职责。”其第一章第二条称：

全俄总司令部负责领导：（一）和平时期、动员阶段和战时的国外谍报侦察；（二）在共同和平会议工作结束后，深入研究同情报“动员”密切相关的一切问题，而这种“动员”既能保证宣战时情报工作的连续性，又能保证国外谍报网与各大国军事同盟相适应；（三）依据第一条及同条第一

和第二项注释，对在俄罗斯共和国境内开展情报工作的所有机关，划分情报工作区域和布置情报工作任务；（四）对我情报机关获取的情报，进行最终整理加工和条理化工作。

为取代被解散的最高军事委员会及其司令部，建立了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及其司令部。Б.М. 沙波什尼科夫被任命为该司令部情报部部长，Ф.Л. 格里戈里耶夫被任命为该部情报处长。

1918年11月1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Э.М. 斯克良斯基<sup>\*</sup>、总司令瓦采季斯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К.Х. 达尼舍夫斯基批准了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的编制，任命前沙皇情报军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革命军事法庭成员、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政治委员谢苗·伊万诺维奇·阿拉洛夫（1880—1969）<sup>8</sup>为登记局长。后来阿拉洛夫在劳改营一直呆到1953年。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的组织结构中规定设立登记局，负责统一领导谍报和军事反间谍机关。登记局由两个处组成：1处——军事监察处（即反间谍处）和2处——谍报处，该处编制为39人（包括技术人员）。登记局内部举办情报和军事监察训练班。登记局和训练班按照命令安置在莫斯科普列奇斯捷诺克街35号、37号和39号楼，军事人民委员部作战部从前就在这几座楼里。从1918年5月起，阿拉洛夫就领导军事人民委员部作战部，现在大部分工作人员和他一起从该部转到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按照编制，登记局长的下属有：顾问 Г.И. 特奥多里（他还是情报和军事监察训练班的负责人）；谍报处长 В.Ф. 塔拉索夫，但几天后他就奔赴前线，由 Г.Я. 古特列夫任代理处长；该处政治委员 В.П. 帕武良，他很快就成了阿拉洛夫的副手；谍报科长 Г.Я. 古特列夫，不过 В.А. 斯雷瓦林调到谍报科工作后，接替了他。军事监察处（反间谍处）由 М.Г. 特拉克曼及其助

---

\* 根据正式文献材料，斯克良斯基（1892—1925）并未担任过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他在1917—1918年曾任副陆海軍人民委员。1918—1924年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24年4月后未再担任）。1925年在美国出差时溺水死亡。——译者注

手、拉脱维亚人 B. 施泰因加特领导，他们都领导过军事人民委员部作战部军事监察处的工作。不过，军事监察处受登记局管辖总共只有两个月，之后该处转属全俄肃反委员会，其名称改为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局，局长为 M.C. 克德罗夫。

登记局 1 处 1 科科长斯雷瓦林在其谍报机关 10 个月工作总结报告中说：

正确的情报组织应被视为有如国家武装力量组织那样不可或缺，而且是国家武装力量不可分离的补充，否则，军队只能成为封闭的机体……

情报工作不能成为临时安排的事情，也不是手工业，因为它的基础是人数很少的秘密谍报网的活动，而这些谍报人员要精心挑选，尔后进行培养训练，传授需要的技能和知识，最后，在其常常成为重要军事行动根据的情报被认为可以信赖之前，还必须经受多次考验。做情报工作务必坚定顽强，持续不断，同谍报员的联系务必可靠。在国外的秘密组织应当是绝密的，谍报机关应达到以下标准：某个谍报员被捕或叛变，不会导致整个组织被破坏。谍报员的数量应该足够多，以能够通过大量印证，检验谍报员情报的真实性。

这份文件强调指出，欠缺愿意从事谍报工作的人员，党的工作人员中可用人员的比率很低（低于人员总数的 35%）。该报告还提到，谍报机关人员所受的教育程度低（66% 的谍报员所受教育程度是城市中专或者教会学校毕业），50% 的谍报机关人员是工人，90% 的谍报员不但从未搞过秘密军事情报工作，而且甚至从未搞过党的秘密工作。谍报机关还有其他缺点，斯雷瓦林指出了其中一点，即工作人员对从事系统、细致的工作缺乏强烈的愿望和客观态度。报告的作者在总结时提到了以下缺点：（一）谍报机关为数不多；（二）工作人员频繁变动；（三）配备干部未经选拔；（四）通信联络情况不佳；（五）“权力分散”（“在最近 3 个月呈送的陈述整个情报事业的大量报告中，

列举了从肃反委员会到各集团军司令员在谍报工作中碰到许许多多障碍的事实。”）。可以援引格奥尔吉·伊万诺维奇·捷奥多里的“档案”为例。1919年3月1日，阿拉洛夫在军事人民委员部作战部和登记局最亲密的助手捷奥多里被派往立陶宛、拉脱维亚、北方面军和其他方面军出差，执行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的谍报侦察特别任务。3月12日，他在德文斯克被特别局的人逮捕并押解到莫斯科。由于被怀疑搞间谍活动和参加了反革命组织，被囚于莫斯科布蒂尔斯克监狱和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局，一直到1921年1月4日。获释之后，他历任工农红军的各种职务，直到1937年4月再次被捕，并遭枪杀（1957年恢复名誉）。

1918年12月，全俄肃反委员会从军事部门收回了并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登记局的反间谍机关（军事监察处），并完全改变了该处业已积累了一定工作经验的领导班子。由于捷尔任斯基的努力，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在1920年11月通过了由列宁亲笔签署的一项决议：登记局（军事情报机关）既隶属革命军事委员会，又以局的规格隶属全俄肃反委员会。但是，这项决定并未执行。

1919年6月19日，第一次通过了登记局条例。根据该条例，登记局被确定为“中央秘密谍报侦察机关”，归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绕过该委员会野战司令部参谋长）。登记局内设三个基本单位：第1处——陆军谍报处，第2处——海军谍报处，第3处——战时检查处。陆军谍报处由四个科组成：北方科、西方科、近东科和远东科，其中远东科的工作区域包括西伯利亚、中国和日本。该处处长是H.M.奇希尔任（纳扎罗夫）。但是在那些年代，领导人员经常变换。例如，早在7月份，阿拉洛夫就将其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政委的职务交给了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委员C.I.古谢夫，而在1919年初，他已交出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职务。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古谢夫（1874—1933）当上了登记局局长。后来他担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1924—1933年则在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工作。古谢夫之后，1920年1—2月，由Г.Д.皮亚塔科夫领导登记局；从2月起，则由弗拉基米尔·

赫里斯季安诺维奇·奥谢姆（1879—1937）领导<sup>9</sup>；到 1920 年 7 月，扬·达维多维奇·伦茨曼<sup>10</sup>接替了奥谢姆。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登记局的几位副局长身上。1919 年 9 月，B.Л. 帕武良被解除这个职务，接替他的是 T.Л. 萨姆索诺夫，尔后（从 1920 年 2 月起）是 Д.Р. 伊波利托夫，而自 1920 年 9 月起则是 A.Я. 赛博特。到 1921 年 1 月，又来了一位副局长 A.М. 乌斯季诺夫。

谍报处处长也不断更换：1919 年 6 月，B.Г. 济韦尔特当了几个星期处长，尔后领导该处的是 H.М. 奇希尔任，从 12 月份起为 B.К. 瓦尔特，1920 年 1 月起为 B.Н. 索科洛夫，4 月起是 A.П. 阿普申，1920 年 12 月起又改为 Я.К. 别尔津。登记局的地址为：卢比扬卡广场 12 号楼。

1919 年 12 月，召开了登记局工作人员、各方面军和集团军代表、俄共（布）各国外局代表参加的会议。T.Л. 萨姆索诺夫在会议上宣称，在他来接任登记局副局长之前，谍报工作几乎没有开展起来，在此之前是无法召开类似会议的，因为登记局的各任局长只是被任命为这个职务，而没有履行这个职务；此外，也需要时间将所有军事专家从登记局中“清洗出去”——现在他们已经不存在了，今后谍报侦察将是阶级的了。

到 1920 年前，登记局为情报工作耗资近 600 万卢布。在编谍报员为 285 名。

从 1920 年 1 月 1 日起，登记局实行新的编制和条例。现在该局由四个处组成：动员处、行动（谍报）处、信息处、财务管理处，稍后又增设一个公共处。动员处吸收工作人员做“秘密情报工作”，训练他们，为他们制定工作细则和规定。

奥谢姆在 1920 年 4 月曾经指出，在国家“边境地带”白卫军后方开展的情报工作，随着这些边境地带的敌人被肃清而日渐失去其意义，或者收缩到最小的规模。在西欧国家、日本和美国开展深入的情报工作已处于首要地位，因为这些国家被视为潜在的敌人。奥谢姆写道，国外秘密情报工作明显不同于在白卫军后方进行的情报工作，前者需要开阔的政治视野，熟悉语言及当地环境。为此从（革命前的）